

研文

肆言

文与中日文学研究

YANWEN SIYAN
WEN YU ZHONGRI WENXUE YANJIU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

日本经典作家作品研究举要

文学理论研究

中日学者对话

陈多友 著



627

江頭大學出版

研文肆言

文与中日文学研究

YANWEN SIYAN
WEN YU ZHONGRI WENXUE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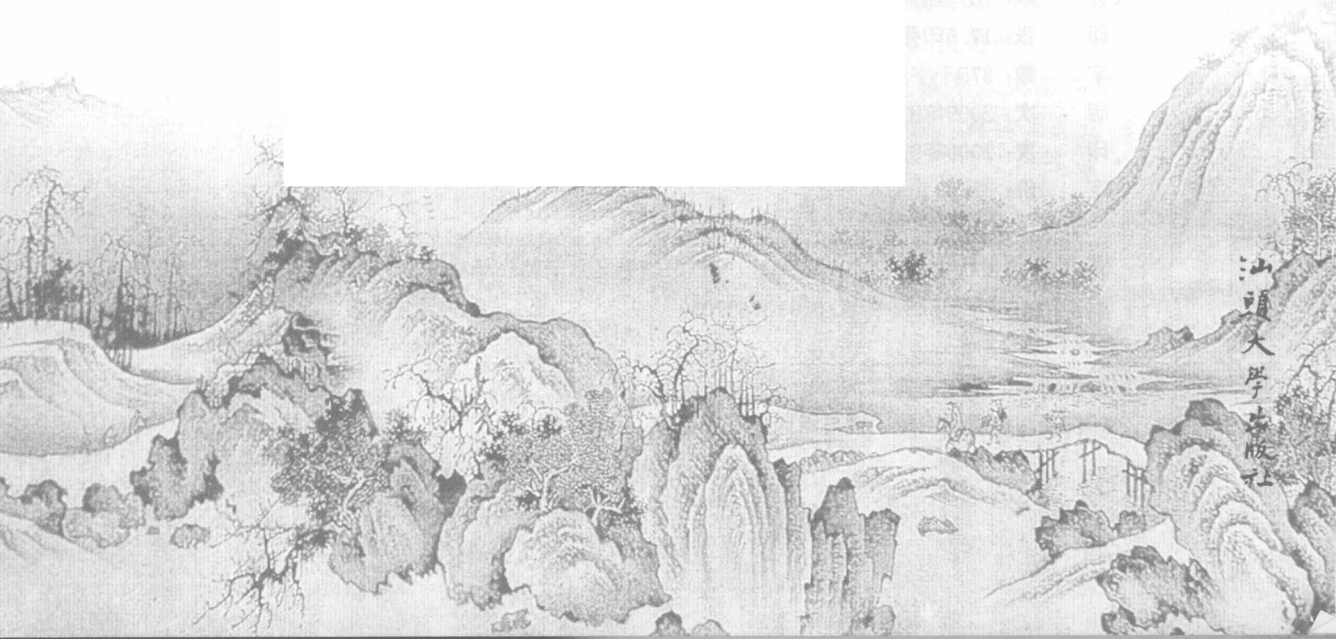
陈多友 著

文学理论研究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

日本经典作家作品研究举要

中日学者对话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研文肆言: 文与中日文学研究 / 陈多友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1120-693-7

I. 研… II. 陈…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日本 IV. I206 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7238号

中文简体字版©2009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研文肆言: 文与中日文学研究

作 者: 陈多友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叶 慧 马世安

责任校对: 叶思源 王小霞 王爱方 汪艳蕾

封面设计: 王 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钱 丹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印 刷: 广州东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7.5印张

字 数: 375千字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ISBN 978-7-81120-693-7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56号3栋9A室 邮编 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传真/020-37637050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代序	(5)
----------	-----

第一部分 文学理论研究

评铃木贞美文艺观	(13)
试论罗兰·巴特的快乐的符号学	(28)
试论当代日本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	(47)
评析小森阳一现代文学理论与历史认识观	(54)
试析小森阳一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	(63)
试析小森阳一批评理论	(73)
全球地域化语境与文学研究	(92)
试论日本当代文艺批评	(100)

第二部分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

论志贺直哉文学的自然观	(113)
试论川端康成初期文学中的佛教思想	(123)
浅析池田大作之“人”的文学观	(131)
刍议中日文学关系	(140)
浅析白桦派与周氏兄弟之关系	(146)
关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几个术语的考辨	(157)

第三部分 日本经典作家作品研究举要

一、安部公房研究	(179)
二、芥川龙之介研究	(181)
三、井上靖研究	(190)
四、川端康成研究	(194)
五、三岛由纪夫研究	(199)
六、森鸥外研究	(206)
七、中岛敦研究	(214)
八、夏目漱石研究	(217)
九、大江健三郎研究	(226)
十、大冈升平研究	(229)
十一、志贺直哉研究	(232)
十二、横光利一研究	(237)
十三、上田秋成研究	(240)
十四、井原西鹤研究	(242)

第四部分 中日学者对话

大众媒体墙与心脑控制	(246)
跋	(279)

代 序

在实际进入研究一系列问题之前，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就两个问题有个基本梳理：一、何为“文”？二、何为“文学”？但是，一旦开始议论“什么”是“什么”的时候，问题就变得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在正解式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或者正在成长的知识人，大多习惯了下定义，归纳中心思想，抽绎主题，或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似乎有无数不证自明的法则、道理、真理在等待我们去揭示，去遵守。如此老套地去看“文”和“文学”在不久之前好像仍然是传统。不过，如果结合当代语境，利用一些新的方法论，从新的视域，带着不疑处存疑的眼光去重新思考重新探究一些问题的话，我们或许就能够豁然开朗，获得更多的发现，寻绎出更新的价值与意义。无庸讳言，关于前述两个问题的认知，也同理可证。

一

现在话题就回到何为“文”。“文”是汉字的一个部首，属象形。甲骨文中此字象纹理纵横交错形。本义：花纹；纹理。故，《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文。《文心雕龙》云，物相杂谓之文。《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记载，五章以奉五色。“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实际上，作为历史文化概念，它有丰富的多义性，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兹归纳如次：

首先，“文”是相对于“言”的书写符号，与“字”属于同一范畴，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文字”的意思，而“字”到了秦朝才有此意。分开来看，“文”指独体字；“字”指合体字。笼统地说，都泛指文字。《后汉书·张衡传》云，饰以篆文。《汉书·刘歆传》载，分文析字。《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云，夫文，止戈为武。又如：甲骨文；金文；汉文；英文；文迹；文书爻；文异；文轨；文狱；文钱；文状；文引；文定等。

其次，“文”指文章，是书写体，语言表现艺术。遣造的词句叫做“文”，结构段落叫做“章”。《孟子·万章上》载，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又如：文价；文魔；文会；文移；文雄；文意；文义；文情；本文等。

引申了去，“文”意味着“美德”；“文德”。杜牧《感怀诗一首》吟道，圣云继之神，神乃用文治。又如：文丈；文母；文武；文命；文惠；文德；文薄；文昭等。“文”亦指“文才；才华”，亦谓有文才，有才华。汉·司马迁《报任安书》云，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又如：文业；文英；文采风流；文郎；文彦；文通残锦。

“文”者，文献，经典；韵文也。《韩非子·五蠹》有云，儒以文乱法。《说文解字·叙》曰，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文”亦指辞词句及文字记载。如：文几；文倒；文过其实；文义；文辞；文绣。

“文”也意指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经纬天地曰文。又如：天文；地文；水文；文象；文曜；文昌等。

“文”亦意指文治；文事；文职。与“武”相对。《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云，文能取胜。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载，文武并用。又如：文臣，文吏；文席；文品；文帅；文

烈；文员；文阶；文道；文业；文僚等。

“文”指法令条文。《史记·汲黯列传》载，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又如：文劾；文法吏；文牒（布告，文告）；文宪等。

“文”指古代散文文体之一；别于白话的古汉语书面语如：半文半白；文语；文白等。

“文”者，文教；礼节仪式也。《论语·季氏》云，则修文德。又如：文俗；文致；文貌；文绪；文仪等。又可指表现形式；外表。如：文服；文榜；文诰。

“文”指鼓乐；泛指曲调。如：文曲；文始等。

另外，勤学好问谓之文。《论语》载，子贡问曰：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文”不仅用作名词，也可以作为动词使用。这种场合它也是极其富于多义性的。首先，在肌肤或其他材质上刺画花纹或图案谓之“文”。《礼记·王制》载，被发文身。《礼记·月令》云，文绣有恒。又如：文笔匠；文身断发；文木等。其次，指修饰；文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身将隐，焉用文之？《荀子·非十二子》云，饰邪说，文奸言，以梟乱天下。又如：文过饰非；文冢等。再次，指装饰。《墨子·公输》云，舍其文轩。此犹文奸。《史记·宋世家》载，文马四百匹。《庄子·人间世》载，若将比予文木邪。又如：文巧；文竿；文舫；文饰；文榭；文舟，文艘；文剑；文舆等。另外，“文”又指撰写文章。如：文匠；文祸；文豪等。

“文”亦是形容词。首先指有文采，华丽。与“质”或“野”相对。《文心雕龙》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易·系辞下》云，其旨远，其辞文。《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又如：文巧；文朴；文服；文砌；文背；文轩；文质等。

“文”是一种温文尔雅的态度，意指柔和，不猛烈。如：文烈。又指美，善之属性。如：文徽；文鸳；文衣。“文”又通“紊”，指紊乱的状况。《书·洛诰》载，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汉书·郊祀志上》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庆劭《风俗通义·山泽》载，王者报功，以次秩之，无有文也。

而且，从品词看，“文”还可以作量词，用于指旧时的铜钱。如：一文钱；不名一文等。或计量纺织物，如，《后汉书》载，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

以上从词法的角度归纳了作为语词的“文”的机能。但是，这远远没有构成对“文”的解释。事实上，自从宇宙化育过程中偶然诞生了人类，世界有了意义，文的存在就被赋予了本体性，其价值影响至人类文明的所有领域，自古及今，围绕“文”的价值与意义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例如，刘勰之《文心雕龙》说就是中国知识人基于形而上意义对“文”进行探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集大成。在该书开篇《原道》中，刘勰便开宗明义地指出：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人）实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箏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

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玉版金缕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谋，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缙。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探究“文”的根源问题而自称“原道”，便原则性地表明了刘勰的根本观点——“文”起源于“道”。这正应和了儒家对“文”的规定性“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而不逐其末。”“文”之于统治者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足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没有比“文”更为神圣的了。因此，刘勰把“文”的缘起说得神乎其神，竟然将它与宇宙的起源直接关联起来，这就使得“文”漾起了神秘主义色彩。在对“文”的概念的阐述上可谓玄妙至极。他指出，“文”包括“天地之文”、“人文”以及“神理之文”。“天地之文”指自然现象，“神理之文”乃所谓神灵的显现，而“人文”，在刘勰看来，既指文字，又指文章。显然，前两者与后者并非同质，但是，刘勰却把它们混为一谈。关于文字的产生，他时而说：“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时而又说：“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关于文学的缘起，他时而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时而又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可见，为了神秘化“文”的起源，刘勰在某种程度犯了逻辑错误。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按照刘勰的逻辑，有天地便有了人类，也便有了文学。天、地、人、文是同时出现在宇宙间的。换言之，作为观念形态的“文”（文字，文学）与物质的天地万物之间，没有什么存在决定意识或意识决定存在的关系，他们皆为本体性存在。这显然是以“天地之文”神话“人文”，因此，他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不过，从后来他对“圣文”与“圣人”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上，我们些许看到了“文”的社会属性以及“人文”与“天地之文”、“神理之文”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学科意义上的“文”的概念，林少阳有很好的总结。他指出，就该概念“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划分，但这些划分之间未必历然可辨。如南北朝时宋明帝曾设儒玄文史四科。章太炎讨论‘哲学’在中国学问中相对应的研究领域时就曾提及此四科：南北朝‘哲学’为玄学，但当时‘玄’、‘儒’、‘史’、‘文’四者并称，‘玄学’别‘儒’而独立，也未可用以

代‘哲学’”。他还分析道：“清代则有义理、考据、词章之分。戴震谓‘义理’即考核文章两者之源也’，未免有以‘义理’傲视其余二科之嫌。然其门下段玉裁则称‘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曾国藩更将三科变成四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也’。不过，戴震的‘义理’是建立在对上述曾氏所说的‘义理’（宋学）的批判之上的。需要注意的是，按段氏的说法，戴氏将三科合为一事，而曾氏力主‘阙一不可’，章氏也强调南北朝‘玄’、‘儒’、‘史’、‘文’四者并称，颇耐人寻味。”

在现当代文艺学及批评领域，“文”与西方语境中的书写体（écriture）相当。后者来自法语，在英语中翻译作 writing 或者直接用 écriture。écriture 也具有多义性，例如罗兰·巴特就在十分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此概念。按照林少阳的说法，罗兰·巴特甚至将所有的视觉性的符号体系都纳入其中。如，其著作《符号帝国》居然将日本的禅诗亦视作 écriture。而德里达则更多地将它看作一个对应于西方声音中心主义的对立概念，即在主张文字语言的优越性的意义上使用它。因此，林少阳认为，écriture 是西方语境下对“书写体”或者“书写语言”的表识，它有许多独自的规定性：1. 它是德里达文字语言学意义上的“文”的概念；2. 它指一种以意义衍生为目的的写作行为，以及作为前者之产物的符号体系（书写方式，文字艺术等）。前者是生产文本的实践，后者则意指在脱离“作者”这一超越性存在的前提下，一个脱离前述实践并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意义衍生可能性的符号体系；3. 有别于“文体”。文体是个人化的、与某个作家的技巧相配套的存在，而前者则是一个时代的作家中具有一定共性、规则性、习惯性的整体。可见，écriture 概念中浓缩了当代西方知识人对“书写体”或者“书写语言”的认知，体现了西方文人的价值体系。

相形之下，“文”的概念是汉字文化圈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人思想史上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在汉字文化圈思想传统中有着广泛的外延，它不只是书写行为或者语言表现艺术，而且还有伦理道德等层面的意义，围绕它的展开，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独特的价值认同理路。不过，尽管我们不能够完全将东方的“文”与西方的 écriture 划等号，但是，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重叠性。所以，我们在考察“文”之际，也应该以 écritur 为参照系，以超越东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为前提条件。

二

对“文”进行一番探究之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文学”。什么是“文学”呢？

若简单地从类别来看其内容，似乎尚有比较清晰的理路可辨。有人做过很有参考价值的分类：就后工业社会语境而言，文学按体裁可分为：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网络文学等；按时代可分为：古代文学、中世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若是按地域可分为：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岭南文学等；按接受对象可分为：儿童文学、成人文学、女性文学、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宗教文学等；按内容可分为：史传文学、纪实文学、奇幻文学、报道文学等；按体裁可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戏剧、歌剧、剧本、民间传说、寓言、笔记小说、野史、童话、对联和笑话等；其他如史传、哲理、赋、骈文、小品文、文学批评、有文字剧情架构的电脑游戏与动漫；按创作风格与理念则可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等。当

然，还有其他分类，在此不一一列举。

若从价值定位的高度来看，一言以蔽之，文学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方式，是用来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实际上，从更为本质的方面来看，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类把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并使之成为人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这个方面就越是突出。人类的生存正是以满足这种更内在、更本质的需要而展开的，从这一意义来讲，文学不是别的，文学正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因此，无论古今东西，人们习惯于把文学比喻成人类的精神食粮，这形象地说明，文学之于人类，是极其珍贵的价值诉求。

我们也可以从根源上探讨一下“文学”的来历。文学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文章和博学。从现有文献记载看，“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中，直接地指文章和博学，被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文学：子游^①、子夏^②”，其意为“文之学”。中国古代管理文书、执掌学问的官职也曾使用“文学”命名。后来的《魏书·郑义传》有云：“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在此文学是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文学也指人的博学，即今天意义上的学识或学术，如哲学、历史、语言等。在文章价值高涨的六朝时代，“文学”一语被用来表达“文与学”的意味。

同时，中国的全盘学艺被称作“六艺”。古代《周礼》载：大司徒、保氏等官职中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谓。儒家奉若神明的六种经典，即《庄子·天道篇》所记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作六经，而六艺却一直被用作其别称。这些有时被统称为“艺文”或者“文艺”。日本学者铃木贞美认为，在“艺文”或者“文艺”中，以儒学为中心的、使用文字书写并成为了学问对象的文献就被称作“文学”。

文字记述的学问或者说将“文与学”合二为一的“文学”也有类别之分。汉代以后，传统上将其分作四类：经、史、子、集。后来各部分内容曾经历过多次整编，但是，各属领域基本稳定。“经”是包含佛典在内的说教类的古代典籍；“史”就是今天所说的历史书；“子”是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思想家的作品；“集”指的是诗集等编纂类文献。如此分类法迄今没有变化。在“子”部的末端有时亦涵盖小说类作家。

中文语境的“文学”与英语的“literature”相遇，并形成对译语词是在19世纪中叶。当

① 子游，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仕鲁为武城宰，在今泰安。索隐：吴郡有言偃冢者，盖吴郡人为是也。大约言子是卒于鲁的。子游是孔门按照现存文献看最擅长礼学的。当时的吴国，就其土著来说属于东夷，而吴国王室却本来是太伯之后。这使得吴国基本上是一个不知礼仪的国家，按照《三国志》、《后汉书》的记载，其地到那时尚且短发纹身，穿钻头衣服，而且民风好斗轻生，男女无别……但另一方面，吴国王族的季子，又是出名的擅长礼乐，夫子还曾向他学礼。晚期的吴王夫差也能受中原礼制约束，不灭人国，不强无理，后来黄池会盟，也能按照中原礼制，着中原礼服。从今天的文物看，当时一片中原化景象。我们难说子游生于怎样的背景，但从子游的执礼来说，他用的是纯正的古礼。可见，之于子游，文学实为“礼学”，侧重的是语言行为规制的教育与研究。

② 子夏，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家语云卫人。郑玄曰温国人。在孔门中，子夏称为文学。先师去世后，子夏居河西，为魏文侯师，带有一批学生，而李悝、吴起，是犹以政事成名者。子夏泽及后人的贡献，更表现为他遍讲经书，为之羽翼。今天存留的《诗序》，大序为子夏作，小序为子夏、毛公合作。一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曰：“敢问《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体现了以哲理、政事解诗的思想。礼学，子夏不如子游细致，但子游没留下什么好弟子，故今之礼学，受业于子夏者多矣。现存《仪礼丧服传》，便是子夏之徒的作品。同时，子夏一派注重发掘春秋之微言大义，求其褒贬，论其大道，这与以政解诗是一脉相承的。子夏之春秋学辗转相受，至汉写成《公羊》、《谷梁》二传，春秋大义，实赖此而传。

时，英国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编撰了“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英华词典）与“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华英词典）。例如，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 - 1857）编撰的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46）中，作为“wenxue 文学”的译语，使用了“polite literature”一语。相形之下，W. Lobscheid 编写的 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866 - 1869）中，则将“literature”的译语定为“wen 文，wenxue 文学，wenzi 文字，zimo 字墨”。其他同类辞书亦基本上做同样的处理。

后来，中文的“文学”被一义性地定位为高级的“literature”；而英语的“literature”却极其具有多义性。其实，后者即便在今天，其意指也是非常宽泛的，它指代“writings”的集合，即所有的用文字书写出来的本文。最狭义的“literature”是“polite literature”。而且，这个概念一般指代“the humanities”（人文学）著作。正因为中文的“文学”即经史子集恰好相当于“the humanities”，所以被翻译成了“polite literature”。

及至现代，东亚知识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汲取西方文艺学观念，对文学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文字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它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歌词、剧本、学术等一切形式和内容。例如，铃木贞美就认为，当今“文学”文类概念意味着“语言艺术”，它已经形成以“诗歌”、“小说”、“戏曲”为中心，以“随笔（essay）”等为主要下位文类的范畴，其上位概念为“艺术”（其对立概念为“技术”），对立文类有“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等。一般而言，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文学”，是以“人文学”或“人文科学”（对立文类为“社会科学”）为上位概念、以“哲学”、“（历）史学”为对立项而编成的。

尽管时至今日文学似乎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存在，就该概念已经生产出相对固定的言说方式甚至制度性的话语、理论，但是，人们对文学的认知、考辨却远远没有结束，关于它的言说，可谓人言言殊；文学观亦因人而异，因时不同。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具有关心国事民瘼的传统，所以往往将“文学”与社会正义挂钩。因此，“发奋说”、“言志说”等自始至终大有市场。以至到了现代仍然有人认为，文学是作家的良心。要彰显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彰显文学所倡导的艺术精神。作家要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天下苍生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表达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文学来自时代前沿、应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性。诗歌不但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诗人要用语言解析生命，用诗魂感知灵魂。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写作是知识分子灵魂栖息的一种方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不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丧失良知和操守。

不过，受儒家“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念熏陶的中国知识人也兼备以文参与体制，博取功名的价值取向。他们主张“为天子师”，“以文报国”。若是换成当今的话语，就是在提倡文学要突出主旋律，关注新生活，讴歌新时代，体现了文学家与时代共同进步、与人民血脉相连的精神风貌；表现变革时代社会精神生活和人民情感世界的嬗变，展示了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时代风貌。文学的使命决定了作家必须投身于如火如荼的事业，有使命感、责任感的文学家必须着眼于关注时代，关注民生，让自己的笔紧扣时代脉搏，为伟大的民族复兴放声讴歌。

也有人把文学当作一种“怡情养性”、“陶冶情操”的纯粹的审美活动。他们讲求的是“文”的情、理、意韵、趣、味、生命律动；追求的是虚实相生的境界，情、神、意的体味和感悟，即“不尽之意”；玩味的是“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情景相溶的表现手法。所以，

川端康成说：“所谓文学，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即使在一片叶上或一只蝴蝶上面，如果能从中找到自己心灵上的寄托，那就是文学。”在这类文学家看来，“文学造就了人的心灵，因为有了文学，我们的心灵不再粗俗，不再浅陋，也不再虚伪和贪婪，它如蓝天下的云自由舒展，又如林中的月光，朦胧而神秘；它像冬天的雪，在肆虐的北风中拥有一方圣洁；它像一棵春野的草，顽强而不乏快乐地追求阳光、和风 and 朝露。如果没有文学，人的心灵一定像夏夜一样黑暗，像徙鸟一样没有家园”。

现在，又有人从文化研究角度重新审视“文学”。将已经从神圣的艺术殿堂里走向文化边缘的文学置于更宽广的语境下进行认知，它们成为了书写形式、符号体系、话语方式、权力关系乃至价值体系。在它们看来，文学不在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形形色色的具体的文本。而文本与物质文化，文本与后现代社会，其横向连带关系日益拓展开来。文本与地图、建筑、媒体、音乐、行为艺术等等广泛关联，表现出复合型、多义性叙述症候。它不只是互文性的纵向延伸，同时还是横向的文化相互性的拓展，文学与物质文化的关联，文学与文学以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日益变得重要，这就给我们带来更敞开的视野，更加鲜活的刺激，更为深邃的思考。

但是，不管文学家、理论家们如何看待文学，如何苦心孤诣地对它做出种种规定性，文学依然像法国艺术哲学家泰纳所表述的那样，根据时代、环境、人种的变迁而变迁，我行我素地向前发展。既然我们不能断定文学究竟是“什么”，那么勿如把眼界放得更加开阔些，从“文”与“学”的高度，将一切书写体的或社会文化叙事的符号体系，都视为可读的甚至可写的文本纳入文学范畴，分别予以阐释或解读，只有这样文学才会真正成为开放的意义世界，才能够给我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资源与精神财富。

结语

总而言之，要想给“何为文”“文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一个说法，就不要忘记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深刻复杂的精神活动和变化多样的语言形式。正是这样一种思考促使笔者做了本书所呈现出的些许尝试性的研究工作。

本书属于横向课题研究项目，荣幸获得广州山九物流公司独家提供的经费赞助。在著述过程中得到吉林大学外语学院徐明真副教授的大力支持，她为笔者查证了许多资料、数据，凡属受益之项目皆有标识。我过去的硕士研究生王瑜、兰悦、汪艳等同学，现在或赴日本继续攻读学位，或在国内高校就职，她们都曾为笔者整理、翻译过一手资料。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东京大学小森阳一教授、东京女子美术大学岛村辉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吴定宇教授、中山大学外语学院吴之桐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顾也力教授、东京大学林少阳副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慷慨指教。本书撰写过程中引述了大量前贤方家的言说，在此谨表敬意。同时，本书的出版发行得到以胡开祥社长为首的汕头大学出版社的相关领导、编辑的鼎力襄助，没有他们的慷慨援助，拙著是不可能上梓的。

谨对以上单位及个人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陈多友

2009年春识于广州白云山麓听云斋

文学理论研究

评铃木贞美文艺观

铃木贞美先生是当今日本最活跃、最重要的人文学者之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著名教授。其代表性论著，是1998年刊出的《日本的“文学”概念》。铃木贞美先生长期致力于核心概念之历史沿革的辨析与探究，在搜集大量专业杂志、综合杂志记事资料的基础上，对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史进行了大胆的重编，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富于启示性的论著、论考亦被频频翻译为外文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

铃木贞美教授已在中国做了近二十次学术讲演。第一次到中国社科院参加的学术活动是1993年的“中日大众文学研讨会”，2002年、2008年分别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青岛年会、大连年会上做过主题讲演；2004年4月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基调演讲；2008年12月又应邀出席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基调演讲。

铃木贞美的重要论著尚有《日本文艺史——表现的源流》全八卷、《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闲寂、空寂、幽玄——“日本传统特质”的形成历程》、《多重危机下的生命科学探究》等。其学术努力中始终包含着一位学者对于学术的执著、责任感或学术良心，以及对于宇宙、地球、世界、人类的深切忧虑与关怀。本文拟从以下几个角度对铃木贞美文艺观作一介绍。

一

铃木贞美氏所在的国际文化研究中心是一个十分有代表性的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学术机构，其旨归在于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多年来该机构立足于国际化，与世界各国学者携手推进形式多样的研究项目。迄今为止，日本研究及其相关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各国学者囿于一国主义，各自为战、各自为守，即使合作也是极有局限性的，在全球化思潮蔓延的今天，这种研究方式渐已山穷水尽。因此，铃木氏们正着手反思此前一味追求专业化、细分化的偏狭的研究思路，大力倡导更为开放、多元的研究新思维。为了有效地推进国际化、跨学科、综合性学术研究，铃木氏基于现实与长远的考虑，提出了三项建议^①，并且已经率领其团队

^① [日] 铃木贞美：《华东师范大学学术研讨会基调演讲》，2004年。

付诸实施。

铃木氏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每位学者要认真反思自身所处学问领域的历史，理性考察其形成与展开的过程，即力图将自身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相对化，将传统的知性体系的构成对象化，避免绝对化。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作业，我们必须刀口朝里，无保留地解剖迄今为止被自己视为金科玉律的、无懈可击的知识体系、话语制度，以及创造这些体系与制度的种种文类、概念，进而逐步澄清支撑各种言说与概念的价值观（正统与异端、优势与劣势等二分法的认知模式），与此同时，将其历史变迁的过程予以烛照。

铃木氏领导的研究班底正在开展题为《出版与文学艺术门类的组编与再组编：由近世而近现代》的共同研究。他认为，为澄清文学艺术门类的组编与再组编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将两个领域纳入研究的射程：以大学为代表的学问研究制度以及创造了全社会共同理念的出版制度。关于学问教育制度史，有很多资料，而且积累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相形之下，关于出版史除了少数面向知识人的相关（例如，有关德川时代至明治前中期出版制度组编过程的）著述之外，甚至连浮光掠影式的概要类资料都不甚明了。因此，铃木氏们首先着手进行了前述合作研究。

第二个建议是所谓“大日本帝国文化史研究”。此举的目的在于将《大日本帝国宪法》时代日本内地（本土）所展开的文化与在所谓“外地”（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强制推行的形形色色的日本文化紧密结合起来，重新加以考察。现在亚洲历史资料馆已经将当时的外交文件、军方资料等向世人公开，据此可以获得许多重要信息、数据，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但是，这些史料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关于当时的文化实况，仍然处于杂志类等资料的发掘阶段。铃木氏坚信：若能够以这方面的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广泛开展对话或合作研究，那么即使身份认同不一、立场不同，我们也可以避开观念性的空理、空论的陷阱，把相互间的相关研究推进一步。在前述两个领域，中国、韩国分别存在诸多难以单方面解决的难题，或者说单单着眼于日本与中韩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解决太多的问题，所以，东亚的研究者们必须携手挖掘资料，进而开展合作研究。

铃木氏的第三个建议是：现在，围绕地球环境问题、自然保护等问题，新的生命观在全球范围内被提出，在如此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将迄今为止的生命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方式，就宗教、哲学、艺术诸形式以及自然科学诸领域进行综合性、统一性研究。这延续了铃木氏惯常的“生命主义”或“生命观”的研究，表达了其关乎人类、世界、宇宙的忧患意识。这种研究最初起步于文学，后来逐渐扩延至哲学、宗教、其他艺术门类乃至历史学，扩展为贯通理科、文科的内容繁复的综合性理论体系。

二

上述建议并不是针对今后的课题所作出的理想化预设，而是铃木氏基于本人就日本近代文艺所开展的研究实践得出的科学论断。他指出，其文艺研究本来也以单个的作品及作品群为对象的，以“文本批评”、“同时代表现手法”、“影响研究”、“文艺批评史”等为切入点，逐个澄清研究对象在“文艺史上的地位”。如此作业客观上不断促进了“文艺史的再组编”。这里涉及到个体（作品）、部分（作品群）与整体（文艺史）的关系。而且，由于文艺是文化的一个特殊领域，所以在遵循其特殊性前提下有效地开展系统研究，就能够将“文艺史”（特殊领域）的再组编推向“思想·文化史”（整体）的再组编。铃木贞美列举出规定文艺作

品特殊性的四种相互关联的文化要素，它们分别是：从各个时期的文化政策，文艺思潮、艺术思潮等衍生出的“思潮”、“文学”及其诸种文艺门类与概念，“媒体尤其是出版”，以及读者的“识字能力”的质量。他认为，我们必须对如此四要素进行解析、澄清。“思潮”方面，铃木氏们首先着眼于1910年代前后广泛兴起、1920年代达到鼎盛的“现代主义”思潮以及1905年以降在日本出现过个性化展开的“大正生命主义”。关于后者，他们立足于“进化论接受美学”等角度对始自明治中期前后的该思潮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史以及文艺史三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现在，这项研究正朝着“生命观”的展开推进。

关于“文类及其概念”，迄今为止，他们主要开展了“纯文学／大众文学”^①、“写生／表现”、“私小说／心境小说”^②、“纪实文学”^③等小概念以及处于其上位的“文学”、“历史”^④概念的研究。其中，有关“文学”的研究是铃木氏关注的重心^⑤。

最后他们问津的领域是关于“识字能力”与“媒体”的研究。就前者，他领导的团队曾经将旧日本陆军省进行过的名为《壮丁普通教育程度》调查（以满20岁男性为对象）的结果制作成了柱状图，虽然涉及的数据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通过该图解，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把握当时的大致倾向。据调查，1902年，仅有60%的国民具备了一般的读写能力，可是，到了1913年，同比就激增至80%。如果做一横向比较的话，该数据在全世界都是异常高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日本出版业之兴盛，读书人口增长之迅猛。

所谓一般的读写能力，指的是寻常（普通）小学毕业程度的识字能力。这是什么样的水准呢？为此，铃木氏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賣捌所は韓國東北にも設けたり」，这是1901年京都府公文中出现过的文例，意为“在韩国东北亦设立了销售机构”，其行文措辞之艰涩，想必今天的日本中学生也无法读懂。同时，中学毕业生以上层次的读书人则意味着必须具备读懂英文和“汉文”即中国古典的能力。铃木氏了解到，该项指标在1902年仅为2%，可到了1914年便增长了一倍，达到了4%左右。这里述及的是精英阶层的识字能力。关于这项指标的统计其后少有人问津，直到1930年以后文部省开展统计调查之前，相关数据都是空白的。

铃木氏还独自就该时期知识分子及平民百姓采用的书写文体等进行了调查。尤其是就“言文一致”运动所做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⑥。在识字能力的研究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一向少有人注意的事项，例如，具体每位作者能够读懂几种语言？他们是否阅读外国文艺杂志？他们对中国古典熟悉到什么程度？等等都成为了重要的观测点或

① 〔日〕铃木贞美：『日本の「文学」を考える—文学史の書き換えに向けて』，角川選書，1997年。

② 〔日〕铃木贞美：『梶井基次郎の世界』，作品社，2001年。

③ 〔日〕铃木贞美：「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ジャンル論のためのプロブレマティックなノート」，『昭和文学研究』，2002/2003年，第1～12页。

④ “The Reformulation of the Idea of History and the Publication of Historical Tex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translated by Jeffery Angles, Joshua A. Fogel and James C. Baxter ed., *Historiography and Japanese Consciousness of Values and Norm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North America 2001*, Nichibunken, 2003.

⑤ 以下内容归纳了铃木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日本：作品社、1998）および「『日本文学』という觀念、及び古典評價の変遷—万葉、源氏、芭蕉」（井波律子・井上章一編『日文研叢書22 文学の近代—過渡期の諸相』，2000）等成果的概略。

⑥ 可参照「日本近代における言語意識——読み書き言葉をめぐって」（韓国語訳、韓国日本学協会機関誌『日本文化研究』第七輯，2002年，第17～42页）。

研究课题^①。

关于媒体与出版业，铃木氏的工作中心主要是对创刊于1920年的面向青年人发行的综合性杂志《新青年》的研究，他组织了“《新青年》研究会”^②，这项举措有力地促进了现代主义的研究。在铃木氏的主导下，日文研专门研究班底就巨型杂志《太阳》进行了历时6年的共同研究，众所周知，该杂志对明治时代国民舆论的形成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该项研究成果于2001年汇集出版，名称为《杂志〈太阳〉与国民文化的形成》^③。随后，他又与吕明远、刘建辉等合作，对伪“满洲国”时代的殖民文学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的做法是复刻1936至1941年^④在该地区出版发行的殖民主义文艺杂志《满洲浪漫》，对其做仔细认真的版本文献学梳理、考证，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之上，就当时的“民族和谐”的状况与文化政策提出了诸多崭新的见解^⑤。

与此同时，他们又在共同研究项目《出版与学艺文类的编成与再编成》中设立了分科会，专门分析研究明治时期新式图书出租屋的图书目录，取得初步成果。数据表明：1888年面向读书人的图书目录中英文书籍占三分之一，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方面，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生物进化论占绝大多数，而哲学方面，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社会进化论拥有压倒性的市场。受此启发，铃木氏开始了一向综合性的个人研究，即《价值观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变迁》，此项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结果，但是，仍然在继续深化之中。

三

铃木贞美的所有著述皆有一共同特征——超越陈旧的思维方式，打破传统的知识结构，力求推出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其学术态度或研究方法，首先是将各种思想性立场彻底地相对化，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比较、探究，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关于文学所做的研究工作也不例外。首先，他从“文学”这一概念入手，对迄今为止不证自明的文学认识进行了清理。他认为，“文学”概念支配着文艺表现活动、文艺享受活动的现场，是文艺批评、研究活动的根本，这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原理（principle, discipline）。在其下位，存在着诗歌、小说、戏曲等文类，进而每个下位概念又有下下位概念，例如“小说”之下就有“纯文学”、“大众小说”、“私小说”、“心境小说”等文类区分。进而，更有随笔风格（形式）的“心境小说”是“日本独特的私小说”；于今，“纯文学”、“大众小说”已经没有区别，诸如此类的说法，究其原因，在于无论是何种文类，在其内里都有“非诗歌亦非小说”之类的规范（符码、code）在起作用。于是，“文学”之谓，就成为了相对化的东西。

其次，他对基本概念“文类（genre）”一语进行了历时性考察。他发现，即使在西语中，该语词也只有表示“种”的功能，所以，在某种东西作为文类考虑之际，必须设定好其上位

① 具体请参照铃木贞美：「堀辰雄、文化翻訳者としての」，日本：『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別冊「モダニスト堀辰雄」，2003年2月。

② 「新青年」研究会編：『「新青年」読本』，作品社，1988年。

③ 铃木贞美編著：『雑誌「太陽」と国民文化の形成』，思文閣出版，2001年。

④ 该时期日本殖民者为了欺骗民众，蛊惑人心，推出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其核心就是鼓吹所谓的“民族和谐”的多元文化，然而，其实质是推行殖民文化，为其侵略政策张目。

⑤ 吕元明、刘建辉、铃木贞美共編：『满洲浪漫』（复刻版全6卷）別巻「研究編」，ゆまに書房，2003年。